

漫谈标点分段的古籍

叶 圣 陶

整理古籍，把整篇或整卷的文字分段，加上新式标点，是在“五四运动”之后开始的。大规模地做在解放之后，中华书局的《资治通鉴》和《二十四史》的标点分段，动员人力之多，经历时间之长，都是空前的。今后当然还要做，规模一定比以前更大。但是从整理古籍来说，标点分段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而已。

需要阅读古籍或者翻检古籍的人，情形是各各不同的，有的为了熟习某一门知识，精通某一门学问，有的为了从事某一项探讨，完成某一项研究。这许多人要求不尽相同，阅读古文的能力也有高有低。举例来说，学哲学的学生如果不是专攻我国先秦哲学的，就不一定要把老、庄、孔、墨诸家的书全都读遍，何况要读通这些古籍也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。但是这些学生既然是学哲学的，对我国先秦诸子总得有个大体的正确的全面了解。为了满足这一部分学生的需要，就得有我国先秦诸子的选本，节本，新注本，今译本，还要有精当的提要 and 介绍。整理古籍是为各种各样需要古籍的人服务的，所以要从不同的需要出发，考虑相应的服务的方式方法，因而工作的范围非常之广，标点分段只是开头的一项而已。

光是加了标点分了段的古籍，一般人还是看不懂。即使有

某一段某一节全无生字，个个认得，还是辨不清该段该节的确切意思。这是由于字义、语义、语法古今有异同，典章、制度、风俗、习惯历代有变革，对于这些全都不接头，光看印在书上一行行的字，当然面熟而陌生了。在“批林批孔”的时候，好些风派的论家抓住《论语》里记载的子夏说的一句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指斥儒家是主张读书做官论的。学习得好就去当官，可见学习的目的不正确。可是“学而优则仕”之下，子夏还有一句“仕而优则学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当官得好还要去学习，难道是往什么干校提高深造吗？风派的论家只是各取所需，当然不管子夏还有下一句，真要了解这两句话的人可不能不查究个明白。原来在《论语》记录成书的年代，“优”字只有“余暇”“余力”“优裕”“优渥”等意思，还没有现在的“好”和“优良”的意思。这就明白了，子夏说的是学习有余暇余力就从政，从政有余暇余力就学习（这当然指上层阶级而言，老百姓和奴隶都不在内）。从这个例子可见阅读古籍的人必须记住古今字义是有异同的，而古今有异同的不限于字义一项，还有其他很多项目，前面已经提到了。因此，古籍即使是原有注文的（如《史记》有裴駰的集解，司马贞的索隐，张守节的正义，《三国志》有裴松之的注），你连注文也标点了，对一般人还是没有好处，因为那些注文也是古文。

从古今字义有异同，我想到了字典词典的编辑方法。旧的如《康熙字典》，新的如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，都是在一个单字之下罗列许多意义，任凭翻检的人自己去挑选，去决定，当前阅读的某书某文里的这个字该是哪个意义。决定下来当然有对的也有错的，假如错了，就误解了该书该文的意思了。我想，假如有一部字典，以字的历史为纲，发生发展，孳乳演变，形声通假，方言殊异，凡是历来研究文字的形体、声音、训诂的精要成果，都把它消化了，简而精地收纳在每个字之下。这样，一部字典不是一般人所需，对于需要跟古籍打交道的人却大有

好处，主要就在于它以历史为纲，叙明白了每个字的古今异同。这样一部字典规模太大，不象丁福保的《说文诂林》那样只是把有关《说文》的书剪开了归集在一起，恐怕不容易编辑吧？我想，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，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如今越来越发扬，我所想望的字典规模虽然不小，如果能组成与《汉语大词典》编辑机构相似的机构，也可以发凡起例，着手进行了。这样编辑字典其实也是一项整理古籍的工作。

现在回转来再说标点分段。古籍光是加了标点分了段，一般人固然不能因而看懂，究竟方便了必须与古籍打交道的人。必须与古籍打交道的人可以简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已经通晓某一部古籍而时常需要翻检的人，另一类是必须学习某种某类古籍的人。就前一类人说，他们看不分段没标点的古籍也毫无阻碍，可是看标点分段本究竟可以快些，这个快就是节省了时间，就是好处。就后一类人说，读标点分段本与读旧式本子大不相同。节段的划分，语句的停顿和完足，语言的情态，记言部分是传述还是照录，诸如此类，旧式本子全没交代，标点分段本却给指点明白了，读者虽然不能就此通晓，究竟可以少用许多揣摩功夫，这就是不小的好处。

标点分段本的古籍为以上两类人服务，当然要求一句句子也不点错，一个符号也不用错，一个节段也不分错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即使水平相当高、工作态度认真的人也难以办到。有一位老友看见某些标点分段本错误颇多，不禁叹为误尽苍生，还不如不要做什么标点分段的工作好。我不同意他的看法。我想，就前面所说的前一类人说，他们遇见错误之处一望而知，那就不成问题。就后一类人说，我另有想法。我说标点分段本可以使这类人少用许多揣摩功夫，这只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阅读古籍的基本功主要在于熟习各个时期的书面语言，要熟习就得用心细读，虽然用的是标点分段本，只当它旧式本子看，依靠它而不完全依靠它。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读，本子

上假如有错误，总会有一部分能够发现的。

我这样说决不是为有错误的标点分段本回护。可是在出版工作中，还不能把错误消灭净尽是事实。中华书局为《资治通鉴》和《二十四史》出标点分段本，都请专家任其事，诸家的工作态度都挺认真，可是出版之后，读者提出的修正意见选载在杂志或内部刊物上的就有好些。中华书局曾经请几位先生把《资治通鉴》新本重看一遍，吕叔湘先生分担得最多。随后他写成一篇《〈通鉴〉标点琐议》刊载在一九七九年的《中国语文》上。这篇文章极有意思，吕先生举出一百三十二个错误例子，又把例子分为三十类，让读者按类看例子，知道那些错误何因而致。这不仅使重版的时候得以改正，而且为今后做这项工作的人提供了前车之鉴，使他们不致再犯同类的错误。说到这里，我又要对九斤老太唱反调了，九斤老太相信一代不如一代，我认为样样今胜于昔，出版工作当然包括在内。不用想得太远，就想一百或者八十年前吧，那时候出版一部书极不容易，出版了，由于书籍流通的不便，信息传播的困难，要望集思广益，得到修正，使它进一步完善，真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。如今流通便，传播快，再加上一切为公的精神共同发扬，所以一部书出版，隔不多久称赞的、批评的、提出修订意见的函件就纷至沓来。因而我相信，在出版工作中，今后总有把错误消灭净尽的一天，当然不是专指标点分段的古籍而言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

